*
2014 年 6 月
第 33 卷第 3 期
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Anqing Teachers College(Social Science Edition)
Jun. 2014
Vol. 33 No. 3

网络出版时间:2014 - 6 - 17 14:29　网络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oi/10.13757/j.cnki.cn34 - 1045/c.2014.03.025.html

苏童《红粉》意象的符码解析

徐 江 南
(贵州师范大学 文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00)

摘　要:受古今中外文学创作方式的影响,苏童爱在文中使用大量的意象,借以塑造人物形象、烘托文本气氛、传达他的多元话语。他的《红粉》小说,运用了"旗袍"、"高跟鞋"、"丝袜"、"内裤"等意象,通过人物力争平凡的行为试图做到解构崇高的目的;运用"胭脂盒"、"桃花"和"伞"等意象,展现人物封存现实,磨灭理想的思考;运用"卡车"、"麻袋""枪"等意象,作为架设作者多元历史的符号 ,起到掏空妇女改造的作用。这些意象的使用,使得《红粉》有别于其它新历史小说,成为新历史小说的代表作。

关键词:苏童;《红粉》;意象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 - 4730(2014)03 - 0101 - 05

苏童曾说:"从 1989 年开始,我尝试了以老式方法叙述一些老式的故事,《妻妾成群》和《红粉》最为典型,也是相对比较满意的篇什。我抛弃了一些语言习惯和形式圈套,拾起传统的旧衣裳,将其披盖在人物身上,或者说是试图让一个传统的故事一个似曾相识的人物获得再生。"[1] 苏童采用传统的方式进行写作,作品《红粉》讲述了解放初期,翠云坊喜红楼的两个妓女秋仪和小萼,在妇女改造运动期间的一系列情感故事和命运悲剧。同时,他也努力在传统中寻出新意。他对《红粉》的满意,除传统的故事内容外,还包括传统之外的新鲜,如捉摸不透的"阶级情感"、妇女改造如何引发妇女反抗等。传统之外的"新",不仅新在对看似陈旧的"红颜祸水"的改写与还原,还新在为突出文章主题、提高审美特性采用大量意象的叙述技巧上。

一、力争平凡,解构"崇高"

《红粉》用悲剧性的语言讲述了两个妓女不幸的遭遇:小萼一开始在劳动营里吃苦,后与老浦结婚,但老浦因涉嫌贪污被枪毙,她最后改嫁到外乡;秋仪本与小萼是要好的两姐妹,因陷入"三角恋"的怪圈痛与小萼、老浦关系破裂,无奈之下当作尼姑,后又嫁给驼背冯老五。秋仪与小萼是妓女的代表,她们的大喜与大悲都与解放后的"崇高"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然而,对于"崇高"的理解,她们都表现出与潮流相悖的言语和行为。这一切都源于她们"力争平凡,解构'崇高'"的想法,这类意象包括:"旗袍"、"高跟鞋"、"丝袜"和"内裤"等。

苏童创作《红粉》,试图让人们接受"崇高",也试图让人们看清"崇高"。这个看清的过程,他没有采取惯用的平铺直叙法,而是采用意象反复出现的方式,将他对历史复杂性的思考表现出来。"旗袍"和"高跟鞋",是秋仪和小萼必不可少的生活用品,它们在文中被赋予特定的意义。"旗袍"和"高跟鞋"在文中共出现两次:第一次"秋仪穿着花缎旗袍和高跟鞋,她倚着门,弯腰把长筒袜子从小腿上往上捋",此次"旗袍"和"高跟鞋"是作为秋仪谋生的工具之一出现。妓女要想在喜红楼混出名堂、有头有脸,除天生长相外还要努力修饰自己的外表,在物质相对贫乏的年代,穿着"旗袍"和"高跟鞋"自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就会加分不少。第二次"小萼惊呆了,紧接着的反应就是去抓年轻军官的手,别开枪,放了她吧。小萼这样喊着,看见秋仪很快从地上爬起来,她把高跟鞋踢掉了,光着双脚,一手撩起旗袍角飞跑,秋仪

* 收稿日期:2013 - 11 - 05
作者简介:徐江南,女,贵州遵义人,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跑得很快,眨眼工夫就跑出城门洞消失不见了”,这一次“旗袍”和“高跟鞋”作为阻碍秋仪逃生的事物出现。如果说穿“旗袍”和“高跟鞋”是为了更好地活着,那么秋仪“踢掉高跟鞋,撩起旗袍角”就是为了暂时地活着,对她而言,送去改造就是断送自己的未来。危急时刻,秋仪在“谋生”与“逃生”之间果断选择“逃生”,这一不假思索的行为,传达了她们对改造的反抗情绪。

“丝袜”,同样是秋仪和小萼谋生的工具,但文中“丝袜”又与“旗袍”和“高跟鞋”有着不同的功用。“丝袜”第一次出现,为装饰、也为谋生。第二次“小萼始终恍恍惚惚的,她垂头盯着脚尖,她看见从翠云坊穿来的丝袜已经破了一个洞,露出一颗苍白而浮肿的脚趾”,自进入劳动营,小萼便没有多余的丝袜换洗,加上长时间劳作,“丝袜”自然“破了个洞”。第三次,秋仪托老浦送包裹给小萼,小萼“打开包裹,里面塞着丝袜、肥皂、草纸和许多零食”,此次“丝袜”在众多生活物品中显得十分突出。训练营高度统一的话语掩盖了小萼对美的追求,循规蹈矩的生活使她忘记友谊的温暖,所以,“丝袜”的出现既是小萼改造时追求美的物证,也是她与秋仪姐妹情深的寄托。从这个意义上讲,此前“丝袜”的破裂,也就预示着小萼与秋仪最后姐妹情感由好到坏的变化。“内裤”,在《红粉》中是核心意象,作品从深层面讲述了它所承载的意义。“内裤”第一次出现,是“秋仪和小萼站在栏杆边上,朝喜红楼的窗口望去,一条水绿色的内裤在竹竿上随风飘动。小萼说,刚才忘收了,不知道会不会下雨”。小萼“水绿色的内裤”,在此处反映了她和秋仪的职业与性有关(出卖色相),她的内裤如同“丝袜”、“高跟鞋”一样需要漂亮鲜艳,用之来装饰自己、吸引顾客。“内裤”为贴身衣物,无论是换洗穿着,还是悬挂晾晒一般都会小心谨慎,而小萼却用“内裤”任意晾晒的方式将她们反抗妇女改造运动的情绪表达出来。妇女改造运动波及秋仪和小萼时,她们第一时间关心的不是自己的精神改造,而是担心“内裤”是否会被淋湿,这一担忧就让妇女改造的意义瞬间在琐碎衣物面前变得毫无价值,再一次传达出她们反抗改造的情绪。“内裤”第二次出现在劳动训练营,医生为小萼检查性病,“小萼紧紧捂着内裤,她说,我没病,我不要检查”。为养活自己,小萼在嫖客面前可以心甘情愿地褪去自己的“内裤”,没有反抗,没有怨言,但医生为她检查病情时却极力反抗,从这里可以看到,小萼在不同场合面对“内裤”时态度的前后变化,在她看来:医生连嫖客都不如,让她改造不如让她继续当妓女。小萼的这种想法,再一次使改造的意义变得空洞无力——运动能改造她们的身体,却不能改造她们的精神和灵魂。“内裤”第三次出现,是秋仪出逃成功后回喜红楼取包裹,“走出翠云坊。夜已经深了,街上静寂无人。秋仪走到街口,一种前所未有的悲凉之情袭上心头。回头看看喜红楼,小萼的内裤仍然在夜空中飘动”。此去不知何时才能回来,因此小萼走前的担忧是徒劳的,“内裤”是否会被淋湿也就不那么重要了。“内裤”仍然在夜空飘动,除表明主人许久未归外,也表明秋仪对小萼处境的担忧(小萼此时在训练营的处境就像空中悬挂的内裤一样漂浮不定),秋仪这种漂浮不定的忧虑,正说明她们对妇女改造运动的反感与不屑。

康德说:“真正的崇高不能容纳在任何感性形式里,它所涉及的是无法找到恰当的形象来表现的那种理性观念;但是正由这种不恰合(这是感性对象所能表现出的),才能把心里的崇高激发出来。”[2] 黑格尔也认为,崇高从根本上说是精神性的,是理性压倒感性、观念大于形式,亦即“把绝对提升到一切直接存在的事物之上,因而带来精神的初步的抽象的解放”[3]。然而对于大多妓女而言,理想、精神、崇高等只是一串符号,这些符号背后的深刻内涵她们没有必要深知。她们认为,自己挣钱养活自己并不可耻,当妓女就是为了让自己好好地活着。因此,当妇女改造运动触及身无一技的她们时,她们惶恐不安的情绪不亚于人类面对死亡时的惊慌失措。她们惶恐不安的心情以及一系列力争平凡的行为也就从内心解构了“崇高”的意义。

二、存封现实,磨灭理想

《红粉》尽管是作者为改写“元话语”、摆脱“元话语”的控制而虚构出来的故事,但同时也在这种虚构与真实之间,苏童用现实主义手法将人类最不忍的生存状态展现出来——人虽活着,却不知该怎么活。在暴露理想的脆弱及现实的阴暗这一点上,苏童是“残酷”的,他用现实打碎人们的理想或是将过去的记忆永久存封起来;把仅有的理想撕裂,将瞬间的幻影打碎,不给人以任何念想。小说中代表现实的意象是“胭脂盒”,代表理想的是“桃花”和“伞”。

“胭脂盒”这一意象在文中共出现两次。《辞海》对“红粉”一词原解释为胭脂、铅粉一类的女性化妆品,后代指女性,因此“胭脂盒”的出现除点明秋仪和小萼的现实身份外,还起到了点题作用。“胭脂盒”作为点明秋仪和小萼身份的意象,第一次出现在老浦探视小萼时,老浦说他在喜红楼门口捡到小萼曾用过的胭脂盒并带回家中,小萼让他代自己保管;第二次出现在小说最后:“冯新华八岁那年,在床底下发现一只薄薄的小圆盒,是红绿相间的,盒盖上有女人和花朵的图案。他费了很大的劲把盖子拧开,里面是空的,但是跑出一股醇厚的香味,这股香味挥之不去。冯新华对这只小铁盒很感兴趣,他把它在地上滚来滚去地玩,直到被秋仪看到。秋仪收起那只盒子,锁到柜子里,冯新华跟在后面问,妈,那是什么东西?秋仪回过头,神情很凄恻。她说,这是一只胭脂盒,小男孩不能玩的。”如果说“胭脂盒”第一次出现,故事只是讲述一个女性化妆品的话,那么第二次它的出现就是在广泛意义上代指女性。仔细研读作品,会发现“胭脂盒”第一次出现其实就已超越了对一般女性化妆品的概述。老浦去劳动营探视小萼,半小时内他没有说别的话题,只是伸手摸了一下小萼的下颚;他在喜红楼见到小萼曾用过的“胭脂盒”,没有视而不见,更没有归还主人,而是带回家中代其保管。老浦对“胭脂盒”的占有,正如他对女性的占有一样,属于本能有意识行为。从这个层面上讲,冯新华对女性的占有就属本能无意识行为,看到代指女性的“胭脂盒”时,他爱不释手,直到秋仪将盒子锁进柜里,但年幼的冯新华始终不知这个盒子的蕴意为何。另外,小萼将“胭脂盒”托老浦保管,秋仪将“胭脂盒”锁进柜子,并强调小男孩不能玩,说明“胭脂盒”最终远离她们的生活,并被现实存封起来。小萼和秋仪封锁“胭脂盒”的行为,是对男性本能占有欲的文明反抗,也是女性在新、旧世代交替的浪潮下对职业和身份的自我否定。同时,老浦与冯新华,这一老一少对“胭脂盒”相同的喜爱及他们最后不同的命运,也说明了妇女改造运动后旧时代的退出与新时代的发展。

现实的“胭脂盒”被存封起来,理想的“桃花”是否花开叶茂?

“桃花”作为理想的意象,代表秋仪和小萼在妇女改造运动时的精神追求,在文中共出现三次。第一次:“一九五〇年暮春,小萼来到了位于山洼里的劳动训练营。这也是小萼离开家乡横山镇后涉足的第二个地方。训练营是几排红瓦白墙的平房,周围有几棵树。当她们抵达的时候,粉红色的桃花开得正好,也就是这些桃花使小萼感到了一丝温暖的气息,在桃树前她终于止住了啜泣”,小萼止住啜泣,是因为“桃花”的娇艳温暖,也因为“桃花”类似脂粉的颜色。在小萼看来,训练营就是无天理、灭人欲的地方,即使是在春天,她也看不到希望,更谈不上理想。只有在陌生的地方看到熟悉的粉红,她才觉得自己在重生与复燃,换句话说,此时的“桃花”是作为小萼的理想出现的。“桃花”第二次出现在小萼进训练营的第一夜,“一株桃花的枝条斜陈窗前,枝上的桃花蕊里还凝结着露珠。小萼就伸出手去摘那些桃花,这时候她听见从哨楼那里传来了一阵号声。小萼打了个冷颤,她清醒地意识到一种新的陌生的生活已经开始了”。第一次看到“桃花”,小萼还有时间和力气去啜泣,这次却连多看一眼的机会都被哨楼的号声阻断;“桃花”娇艳欲滴,让她忍不住想去摘下几朵,而现实告诉她美丽的事物可望而不可即。小萼对美丽事物的追求最终失败,是哨楼号声阻断的原因,也是她自身没有完成改造的必然结果。说明了旧生活方式对人的毒害深不可测,精神上没有完成改造,审美的同时,美也就被损毁。同时,也映衬出小萼前后形象的逆转:她最初天真、善良,努力挣钱养活自己;后来却好吃懒做、穷奢极欲,不仅害死老浦,也将自己逼上绝路。第三次,“桃花”隐藏在桃花树之下出现:“在麻袋工场的门口,小萼又剥了一块糖,她看到一个士兵站在桃树下站岗,小萼对他妩媚地笑了笑,说,长官你吃糖吗?士兵皱着眉扭转脸去,他说,谁吃你的糖?也不嫌恶心。”此时桃树是否开花,从文本来看无从知晓,但从小萼脸上的笑容可以看出桃树至少在她的心里开了花。小萼在劳动营因为有秋仪的关心,不再举目无亲、不再孤家寡人,她挑逗士兵、不在乎士兵是否会吃她的糖,只在乎秋仪是否还像以前一样懂她。代表政治话语的士兵站在代表个人理想的桃树下,不是欣赏,而是站岗,当个人理想被政治话语监控时,“桃花”也就只能开在心里。同时,小萼在劳动营里没有想过要从精神上将自己真正改造出来,而是依旧贪图享乐,“桃花”最后也会凋零在她的心里,理想最终被她自己的惰性所磨灭。另外,“桃花”的盛开与凋零,也表达了苏童对历史复杂性的思考。

“伞”,谐音“散”,小萼与老浦举行婚礼时,秋仪在店里买了把“伞”送给她们。面对爱情和友谊的背叛,秋仪想散去的不仅是小萼与老浦两人的婚姻,也想散去她与老浦之前的感情以及她与小萼之间的姐妹深情。秋仪和小萼性格迥异,却同时爱上纨绔子弟老浦,但小萼是否真的适合老浦?秋仪不知,所以“散”去之后她说“要是天下雨了,你们就撑我这把伞”。要想理解秋仪所说的“雨天撑伞”,除了解谐音“散”外,还应该从其功能上理解——“伞”能为人们遮风避雨。秋仪口中的“雨天”并非单指下雨之时,还指小萼与老浦今后生活上的困难,秋仪让小萼和老浦在雨天撑她送的“伞”,也就暗指她愿在今后帮助小萼和老浦渡过难关。后来小萼将儿子悲夫送给秋仪代为抚养,秋仪说“我料到会有这一天的”,更加有力地证明了这一观点,只是这把代表理想情谊的“伞”最终碾碎在车轮下。

三、掏空“改造”,架设多元

美国学者海登· 怀特在其《历史主义、历史与修辞想象》一书中说过:“历史话语是同时指向两个方向的符号系统:首先是指向这一系统欲加描写的那组事件;其次是指向一个文类故事形式,这一形式被符号系统私下当作那组事件,目的在于揭示其结构上或过程上的形式连贯性。”[4]《红粉》用大量的意象作为架设作者多元历史的符号,同时也掏空妇女改造的意义,苏童用自己的话语方式呈现出另一种“历史真实”。此类意象包括“卡车”、“麻袋”、“枪”等。

“卡车”是军用工具,在文中用来拉载妓女,使妓女能得到及时的“劳动改造”,从这个角度分析,卡车就是“元话语”的载体。“卡车”首次出现,是在“五月的一个早晨,从营队里开来的一辆越野卡车停在翠云坊的巷口。浓妆艳抹的妓女们陆续走出来,爬上卡车的后车厢去”。妓女在“卡车”上心事重重,不知何时能停,也不知开往何地,这种忧心惶恐的情绪,也就是对卡车“无情”的反抗。无论青红皂白,不问满意与否,“卡车”就将妓女拉至教堂检查性病,“改造”对妓女的无视通过“卡车”这一意象也变成了对神圣的戏谑,以至秋仪说“反正我也活腻了,就是杀头我也不怕”。第二次“那辆黄绿色的大卡车仍然停在临时医院门口,女孩们已经坐满了车厢。秋仪走到门口脸色大变,她说,这下完了,他们不让回翠云坊了”。卡车阻隔了妓女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它的出现,使妓女回不到喜红楼、无法挣钱养活自己、也找不回之前的自由生活;秋仪和小萼出逃不成,重新站回卡车,大骂军官是在不明不白地杀人,她们通过怒骂的行为和语言掏空了“元话语”所讲的“改造”。“卡车”第三次出现是在北门,“卡车经过北门的时候放慢了速度。秋仪当时的手心沁出了许多冷汗,她用力握了握小萼的手指,纵身一跃,跳出了卡车”。秋仪出逃成功,不仅逃离了“卡车”的运载,更是逃离了“卡车”所寓意的“改造”,这一逃跑行为再次用实际行动“改造”的意义掏空。文章最后,经改造后的小萼因无力养活自己和儿子便将儿子托付给秋仪,自己远走他乡;未经改造的秋仪虽没有奢华婚礼和生育能力,家庭生活也算得上稳定、踏实。这种命运的对比,不得不说改造“百害而无一利”。苏童用“卡车”这一意象,承载政治任务,也承载妓女的失落与绝望,用卡车的“无情”掏空改造的意义,并架设其笔下的多元历史。

“麻袋”是军用物资,也是妓女改造时规定的任务,缝不完不能擅自下工。“小萼面对一堆麻袋黯然垂泪,她说,我缝不完了,我的手指都快掉下来了”,“麻袋”使小萼的生活变得冗长、艰辛,她打心眼里认为缝“麻袋”比杀头还难,于是“麻袋”缝不完,她想自缢而死。小萼这种简单的逃避方式不是拿生命开玩笑,而是与“麻袋”和“改造”做斗争,甚至夜里都在“另寻死路”。女干部让小萼说出他的经历时,她想到的依然是那些缝不完的“麻袋”。没有妓院压迫,也没有敌人打骂,只有缝不完的“麻袋”。小萼痛恨“麻袋”,也就是不满统治阶级对妇女的“改造”,苏童用小萼对军用物资、阶级关怀的反感和排斥将妇女改造运动的苍白无力和极度空洞的一元历史暴露无遗。

最后,承接构建多元历史的载体是“枪”。“枪”作为军事武器,没有用于威慑与之对立的敌人,而是用来“维护”顺应时代潮流的“阶级姐妹”。“押队的军官立刻把枪朝说话的人晃了晃,他说,不准胡说八道,这是为你们好。他的神态很威严,妓女们一下都噤声不语了”;秋仪和小萼准备逃跑,被士兵用步枪指着的时候,她们吓得失声尖叫起来,又重新站回卡车;“枪”没说话,也没打响,只需晃一晃、指一指,便威力无穷。现实存在的“枪”用于镇压人们威力无穷,作为不在之在的“枪”更是寓意非凡。秋仪出逃不成,回到卡车便

开始抱怨训练营的简陋,“这时候军官沉下了脸,他说,我看你最不老实,再胡说八道就一枪崩了你”,此时的“枪”没有出现,却是比出现更令人可怕。不在之在的“枪”不仅扼杀了妓女的精神追求,也打破了人们对军队威严庄重的信任。秋仪踢掉高跟鞋、撩起旗袍角逃跑时,“年轻军官朝天放了一次空枪,小萼听见他用山东话骂了一句不堪入耳的脏话:操不死的臭婊子”;一群妓女,反抗“死也不让死,哭又不让哭”的改造生活,她们“冲出来抱住军官和士兵的腿,撕扯衣服,抓捏他们的裤裆,营房在霎时间混乱起来。远处哨楼上的探照灯打过来,枪声噼啪地在空中爆响”;老浦贪污公款,公司没有给他任何悔改时间和申诉机会,枪声响起,他的生命便结束。“枪”不再是无声的恐吓,妓女和老蒲一旦触犯“阶级原则”,“枪”便代表它所属的阶级发出号令,让人无力回抗之时感到毛骨悚然。

追本溯源,“卡车”、“麻袋”和“枪”,也是导致妓女反抗改造的原因之一。它们对妓女采取粗暴的行径让人感到畏惧,只是一味利用这些工具来改造妓女的身体,而忘了她们的精神层面。换句话说,妇女改造的程度和形式只属于治标不治本,她们在生活和精神都难以保障的情况下,也就很难体会到政府给予的“阶级温暖”。以上意象,代表统治阶级执行任务,捍卫“崇高”的同时,也将妇女改造运动的意义解构,借这些意象的书写构建了苏童笔下的多元历史及他对历史复杂性的思考。“它们一方面要揭示出元话语本身也不过是一种话语形态;另一方面,它们以自己的话语方式来言说历史的多种可能性与其他的存在方式”[5],并试图用自身的“功能”说出正史以外的另一种历史“真实”。

苏童采用大量意象,使《红粉》在叙述技巧上区别于其它新历史小说,成为新历史小说的代表作。他从传统文化中吸收养分,让我们很容易跟着他的意象写作,进入他营造的现世环境。这种别具一格的叙述方式,受古今中外文学的影响,不仅使文章主题更加鲜明,还提高了作品的审美价值。学者葛红兵在其《苏童的意象主义写作》一文中,说:“我认为苏童小说的特征主要表现在意象性上。……由此,意象不仅帮助苏童在小说中塑造了凄清幽怨的叙述氛围,而且它还构成了小说叙述的深层动力。这在中国现当代作家中是绝无仅有的,这种以意象性为基本特征的小说语式完全是苏童独创的,它对中国现当代小说来说是一份非常重要的贡献。”[6] 苏童用他的意境书写和理解方式,深入挖掘中国人的性与命,并阐释他对中国历史的另类思考。因此,意象是苏童作品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红粉》中的意象对于研究作家及作品的整体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 苏童. 怎么回事(代跋)[M].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2:307.

[2] 康德. 判断力批判(上)[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104.

[3] 黑格尔. 美学(二)[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78.

[4] 海登· 怀特. 历史主义、历史与修辞想象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185 - 186.

[5] 王又平. 转型中的文化迷思和文化书写 [M].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248.

[6] 葛红兵. 苏童的意象主义写作 [J]. 北京社会科学,2003(2):113.

责任编校:汪孔丰

Code Interpretation of Images in SU Tong's *Rouge and Powder*

XU Jiang-na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Guiyang 550000, Guizhou, China)

Abstract: Influenced by various methods of literary creation at all times and in all countries, SU Tong preferred to use lots of images to mold characters, foil the atmosphere and transmit his pluralistic discourse. In his novel *Rouge and Powder*, he employed such images as cheongsam, high-heeled shoes, silk stockings and knickers and tried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deconstruction through characters' behaviors of being ordinary. He employed such images as rouge box, peach blossom and umbrella to reveal characters' thoughts of folding reality and obliterating dreams. He employed such images as truck, gunny-bag and gun, which served as symbols of building pluralistic history to influence women's reform. *Rouge and Powder*, unique to other new historical novels, has become the representative work through the use of images.

Key words: SU Tong; *Rouge and Powder*; images